

论汉代的社会保障思想

2014年03月17日 10:48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作者:王文涛 字号 [a](#) [a](#) [a](#)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原文出处】 第159~166页

【英文标题】 Discuss the Social Security Thought of Han Dynasty

【作者简介】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王文涛(1956—), 男, 河南潢川人, 历史学博士,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秦汉史、社会史研究。

【内容提要】 汉代社会保障内容丰富, 以民为本是汉代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汉代社会救济思想包括贫困救济和灾后补救两部分, 可以细分为养恤、安辑、赈济、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学说。仓储后备说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荒、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思想。尊老养老不仅是汉代衡量上至将相、下至平民的伦理道德规范, 而且统治者还将其上升至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高度, 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极力倡导全体国人执行。“调均”思想包括贫富有差和贫富有度两个方面, 立论重点是防止贫富过分悬殊, 只有解决好民生问题, 民众才会听命于君主。早期佛教和道教中的慈善思想初具雏形, 开后世宗教慈善之先河。民本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专制统治共存, 属于专制思想范畴。

【关键词】 汉代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救济/宗教慈善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是汉代人口繁衍、物资供应、亲睦百姓、财政充裕和国家富强的基础和条件。要维持农业再生产, 就必须保护劳动力; 保护劳动力, 就要治民、教民, 管理民众之事, 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汉书·食货志》说:“殷周之盛, 诗书所述, 要在安民。”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汉代社会保障思想也不断丰富发展。西汉前期崇尚黄老, 轻徭薄赋, 与民休息。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接受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 施行“刑礼并施”的统治方式, 保民、安民, 以缓和因天灾人祸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安民、保民的社会保障, 也是汉代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汉朝疆域辽阔, 黄河流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赈灾、移民迁徙等社会问题, 国家救荒, “所费者财用, 所得者人心”[1]22。为了减轻民众遭受的损害, 稳定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发展, 必须建立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保障措施。汉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 深知安抚民众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为了笼络民心, 采取了教民、抚民、理民、招民、诱民、救民、安民等多种社会保障措施。汉代的社会保障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涉及古代社会保障的必要性、重要性、目的、作用等诸多方面, 择要论述如下。

一、以民为本——汉代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

民众既是国家政权的统治对象, 又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故民为国之本。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 而要长治久安, 就得重民、惠民、保民、安民, 就要解决民众的衣、食、住、行、育、乐等问题, 汉代社会保障思想就是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家在制定政策、管理国家时也着力贯彻民本主义思想, 平时注意安民、利民、富民, 发生自然灾害, 救灾安民备受关注。

西汉初年以贾谊为代表的民本思想, 是汉初统治阶级寻求社会安定、巩固统治的产物, 是统治阶级顺应社会趋势和民心所向的结果。除了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政治策略曾起了积极作用外, 民本

新闻搜索

热图 | 视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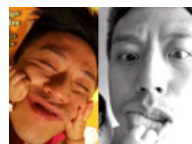
亚航一客机失联



当红女星成长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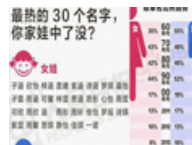
美女泳装秀身材



邓超遭女儿“蹂躏”



猎杀鳄鱼的部落



中国最热名字出炉

频道精选

-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任命
- [公共管理]中国公共管理硕士教育发
- 社科院“财经战略年会”召开 王伟
- 作家陈丹燕谈创作:“要像新闻记者一
- 第六届全国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

思想是西汉初年统治阶级关键性的指导思想，与“无为而治”的思想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贾谊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民众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的民本思想，堪称西汉前期民本思想之冠。[2]

《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认为民是君主统治的基础，“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不是民依赖国家和君主而生存，而是国家和君主倚靠民才能存在和发展。“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民无不为功也”，“民无不为力也”，“国以民为兴坏”。丧失了民，国家要灭亡，各级统治者都无法生存。统治业绩依赖“民”这个主体才能实现，国家和君主的权力也是依赖人民而得到的。在政治诸因素中，作为社会基础的民是最稳定的因素，国家可以更易君主，君主可以变易政治，可以变更官吏，但无法更换民众。“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故因是国也而为安，因是民也而为治。”[3]66贾谊说：“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修政语上》）君主与统治者的博爱之道和仁德之治就是“养民之道”。“故礼者，所以恤下也。”贾谊告诫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爱民、利民、富民。爱民，首先要有责任心和罪感意识。他引帝尧的话说：“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修政语上》）。提出君主要有罪感意识，是对秦始皇居功自傲意识的一种纠正，也是对汉代统治者的一种有益警示，汉代君主多次颁发罪己诏，同贾谊之论不无关系。[4]29

《淮南子·主术训》云：“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君主要想巩固国本，就应该采取安民、利民的措施，“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5]163，“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安民、利民的最终手段落实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安民之本，在于足用”[5]163。足用之本，在于为农民提供安定的生产条件，勿夺农时，轻徭薄赋，节俭费用，“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为抵御水、旱等自然灾害，还要“应时修备，富国利民”[5]106。《淮南子》既言“民为国本”，也讲“民为君本”，显然是君国一体看法的表达。《淮南子·泰族训》对“民为君本”作了形象的比喻：“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民并不是为了人君一人，“天立王，以为民也”[6]398，王权只是授予那些能使民众安乐的有德之君。能以德安民是天选择受命之君的主要条件，受命之君要遵循天道，“任德”以治理天下，人君要有爱民之心。“《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仁者，爱人之名也”。[6]450而爱民就不能“苦民”、“伤民”、“杀民”。民是君的统治对象和财利之源，百姓生活相对稳定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统治者应“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使“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然后“民说从上”。[7]1137他反复借助于天的权威劝君主实施德政，“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6]588。

东汉思想家王符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8]7“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8]17他假天之威，规劝统治者必须按照“民”的愿望行事，“民”之安危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存亡，如果不顾人民死活，使民“饥寒并致”，“则国危矣”[8]23。得民则国治，失民则国乱，民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8]37，“国以民为基”[8]46。王符的“民为国基”论，是在深刻分析先秦以来君之安危与民之穷富密切关系之后得出的。他告诫统治者：“民富则可教”，“民贫则背善”[8]5；“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8]37。他在《潜夫论·本政》中明确提出，为政就是要以民为本。民为天心，顺民即是顺天，违民即是逆天。“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8]17他还主张：“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8]29，帝王的职责是“诛暴除害利黎元”[8]17，亦即所谓“君以恤民为本”[8]19。帝王要“参听民氓”，“勤恤民事”[8]27，“以四海为一家，以兆民为通计”[8]23，不分亲疏，普覆兼爱，为民兴利除弊，“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8]46。各级官吏也要“利民”、“恤民”。他说：“圣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牧养万民者也。”[8]14“任职则思利民”，为官者要想到如何使人民都得到好处。富贵以后不能忘记“得民意”，[8]22要经常考虑到人民的意愿。国家的各种法令也要于“民”有利，主张严厉惩处那些枉法残民的官吏，使“万家蒙乎福”[8]40。他主张以是否“效功百姓”作为鉴别帝王、官吏、法令优劣臧否的标准。“功业效于民，美誉传于世，然后君乃得称明，臣乃得称忠。”[8]64王符提出了“富民为本”的思想，“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民富乃可教……民贫则背善。”[8]5强调富民的重要性，认为是为国之本、太平之基。在他看来，民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富国即是富民，只有民富才能国富。“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富民的结果是为了富君，利民的结果必然是利国。王符能从“民为国基”的高度强调“爱

- “纪念白求恩”75周年座谈会举行
-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学术史梳理：研

24小时排行

- 1 特别策划：博物学与人类文明
- 2 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拉开大幕
- 3 推进农业现代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
- 4 年年岁岁“话”相似 岁岁年年“期
- 5 城市群：21世纪中国发展新的增长极
- 6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学术争鸣大事件
- 7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哲学
- 8 本网特别策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

人文社区

- 60张封面，一部新中国史
- 浅析文森特·梵高《向日葵》的诞生
- 探秘德国经济奇迹
- 寻找中国梦·北京公共交通
- 耶稣的这些事，你知道吗？
- 艺术家的绘画工作日
- 名师画笔下的神圣家庭
- 什么是理想的大学
- 为什么不反鸡汤
- 怎样收藏好丝绸书画

“民”、“利民”、“富民”，提出“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这样具有重要理念价值的政治命题，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史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汉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深知安抚民众、缓和社会矛盾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民为邦本”，必须实施有益于民众的政策，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晁错在上文帝疏中说：“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廩，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7]1131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调整统治政策，“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7]3914使西汉王朝度过了统治危机。宣帝元康四年求贤诏中说：“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7]3209顺帝永建六年救灾诏直接引用先秦思想家的安民抚民观点：“《易》美‘损上益下’，《书》称‘安民则惠’。”《易·益卦》曰：“损上益下，人悦无疆。”《尚书》曰：“安人则惠，黎人怀之。”[9]258下令免除冀州灾民当年的田租和刍稿。在汉代思想家看来，“保息养民”是所有想成为“有道明君”的帝王不可推卸的责任；臣下也认为“君上以安民为明”，主张政府积极介入民众的保障问题，以此实现“仁政”和“德治”。

以民为“本”、爱民论、调和论等，与君主专制是不矛盾的。在阶级社会里，统治人民称为“牧民”，但是在“牧”的方法和水平上，却大有讲究。贾谊认为：“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10]284“牧”，指出了民本思想的本质；“安”，点明了民本思想的目的。只有保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的物质利益和巩固君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倡行仁政的真实目的。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说的“民”不是一个具有严格阶级内容的政治概念，而是与官僚、侯王、封君、贵戚、豪富相对而言的社会阶层，不仅包括广大农民，也包括众多中小地主阶层。因此，所谓“利民”和“富民”，除了期望适当改善劳动人民的境遇之外，还有要求当权者保护中小地主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含义。民本思想就是重民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政权的得失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所以，君主主动调整官民关系，既有利于制驭官僚，又有利于争取民心，是保证君主专制制度长治久安不可缺少的手段。

二、社会救济

汉代社会救济思想包括贫困救济和灾后补救两部分内容。汉代的贫困救济对象主要是孤寡老弱病残和贫困不能自存者，既有经常性救济，也有事后救济，只是救济标准较低，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绵延政权而实施的“仁政”。综观汉代有关社会救济方面的议论和著述，社会救济思想又可以细分为赈济、养恤、安辑、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学说。

养恤说和安辑说是国家如何安置灾民或贫苦流民以安定社会的思想。放贷说是有偿补救灾民和贫民之论，汉代放贷救灾的主张很多，并为统治者所采用，放贷救灾也成为中国古代补救灾民、贫民、恢复灾后简单再生产的经常性措施之一。节约说的基本精神是灾后节省费用，以克服灾荒所造成的困难。汉代以后，节约不仅成为灾荒之年的时议，并发展成为平时崇俭固本的理论。汉代调粟之说较之先秦更趋具体化。

赈济说，是指用实物(主要是粮食和衣服布帛)或货币救济遭受灾害的百姓和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的人们，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一种思想。汉代赈济说以主张“赈物”为主，集中在赈给灾民食物和土地这两个方面。如《盐铁论·力耕》说：“均输之畜，仓廩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为减轻国家救灾开支，刘向主张在“散财以赈贫”的同时，应“列地以分民”[11]300，鼓励灾民生产自救，尽快恢复生产。崔寔的建议更具有可操作性，主张效仿先秦“移人通财，以赡蒸黎”之法，将灾区贫民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宽乡，“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12]445。如元和三年(86)，章帝下诏书给常山、魏郡、清河、钜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9]154章帝下令将空地给农民，并“给与粮种”，提供耕种条件，自然缓和了灾后流民的出现。

汉代赈款救灾主要用于收葬暴露荒野的尸骨，一方面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更主要的是为了收揽民心，泽及枯骨的目的是感动生者。工赈之法始于春秋时期，西汉末年桓谭又提出“以工代赈”论，主张把受灾的“浮食无产业民”组织起来治理黄河，由政府供给衣食。

赈物、赈款、工赈被认为是赈济说的三大具体措施，在汉代都已有实施，并为后来的统治者继承发扬。

汉代社会救济思想与救济实践的发展表现出不平衡性，除了赈济说外，养恤、安辑、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学说多是先秦社会救济思想的发挥，新见不多。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先秦社会救济思想

主要集中在《周礼》和《管子》这两部文献中，对上述几种学说均有较系统的论述。而且，多数学者认为，《管子》除战国作品外，夹杂有秦、西汉时的作品。^①《周礼》成书年代，自古即有争议，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最后成书时间不晚于西汉早期。^②这两部文献中应当包含有西汉社会救济思想。第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奉为经典，文人学士纷纷注经，他们的社会救济思想就反映在其中。

三、积贮备荒救灾

积贮备荒，也被称为仓储后备，是汉代社会保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的社会生产力比战国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但农业抗灾能力依然较低，农业生产处于经常性的波动状态之中，丰歉无常，人们无力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非常重视粮食的积蓄。储粮备荒抗救灾害的思想受到普遍重视，在先秦积贮备荒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

贾谊和晁错是西汉前期大力提倡积贮备荒的著名人士。贾谊从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角度论述了仓储的重要性，粮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平时可以用金银交换，但在国家战备、灾害侵扰的关键时刻，粮食的价值则是金银等贵金属无法衡量的。“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7]1130“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7]1150国家在农业丰收时收购粮食，“储积以备乏绝”[13]263。遇上灾荒，向社会出售，稳定粮价，以安定社会秩序；或者调拨取之于民的粟谷，救济饥民，“赈济乏绝”，减轻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

仓储后备的目的之一是救灾，避免灾荒之年百姓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因此，仓储后备说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荒、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障思想。汉朝兴建了不少大型粮仓，备荒救灾是其主要功能之一。仓储后备思想中最突出的是耿寿昌的“常平仓”之论。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粜，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糴，名曰‘常平仓’，民便之”。[7]1141

实施仓储后备，最重要的是要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的盛衰关系到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物质储备，“食乃民天”，农业的丰歉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君主政治的盛衰安危。重农思想是仓储后备思想形成的基础，发展农业生产是最根本的备荒措施。汉代政府实行重农政策，其中就包括有备荒的用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措施以确保农业发展，各级官吏以农事为首要政务，形成举国重农之势。两汉帝王多次颁发重农诏，强调农为天下之本。贾谊认为“畜积足”的前提是“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7]1130。晁错主张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淮南王刘安把粮食储备的多少看作是国家穷乏与否的标志。一个国家若“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恻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5]105。粮食储备充足，即使遇上水旱灾害，民众也不会有饥寒之患而困穷流亡。灾害发生后人们既要抗御灾害的破坏，又要发展农业生产，重建家园。在抗救农业灾害的过程中，重农思想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抗灾救灾思想。重农并非单纯是封建国家的经济政策，而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和政治方略，是专制君主一项重要的安民之术。[14]342

与仓储后备论相关的还有自然条件改良论。汉代的有识之士既看到了各种自然灾害的客观存在，也认识到了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抗御灾害；除了主张仓储备灾外，还主张采取兴修水利等措施以防御水旱灾害。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班固的《汉书·沟洫志》都体现出了兴修水利防治灾害、造福社会的减灾思想。汉武帝时出现了一次大的水利建设高潮，时人争言水利。汉代人已经认识到，根据灾害发生规律恰当安排农事活动也能取得减灾效果。违背农时会导致灾害发生，应根据农时安排农事活动，以趋利避害。不违农时，则不害农事。

尽管水利说、除害说乃至重农说似乎与社会保障不属同一理论范畴，但对社会成员而言，上述主张的实施均能在客观上起到保障和安民的作用。因此，一些后世学者将其与仓储说归为一类，概称为积极预防论[15]247—269，或事先预防论。[16]

四、尊老养老

在汉代，养老不仅作为衡量上至将相、下至平民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统治者还将其上升至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带头施行并极力倡导全体国人执行。汉代政府不仅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尊老养老的措施，而且将其提到政治的高度，借政策、舆论和礼法之功，来实现“老有所养”。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礼法对不养老、侮老、弃老者严惩；另一方面，将尊老养老突出者树为典型，或名扬乡里，或加官晋爵。“孝悌力田”是汉代察举选官的科目之一，孝敬父母、尊重兄长、

努力耕作者，都有可能被地方基层政权举荐入仕，这一举措为全社会制定了敬老尊贤的行为准则，使之成为有着强大控制力量的精神武器。尊敬和照顾老人是汉代贯彻落实最好的社会保障措施，而且汉代养老的意义已经远远突破了社会保障范畴，逐步上升为政治制度的内容。

汉代制定了不少尊老的法律，对老人特别宽容和优待，对辱老者则科以重刑，从法律思想层面体现了对尊老、养老的重视。对于鳏、寡、独这三类老人给予特别的关注，两汉帝王发布了数十道救助他们的诏令。

汉代十分重视养老教育，以儒家为代表的教育，更是把养老作为立本修身的最基本要求，教导人们要竭力养老，尽心养亲。汉代皇帝宣称以“孝”治国，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17]，对儒家经典《孝经》十分推崇，东汉时将其定为必读之书。《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其目的是想通过“孝”来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为巩固“家天下”的统治服务。

民众只有知道尊老，才能更好地养老尽孝。尊老养老的最高层次，“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17]1598。“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8]充分地阐明了尊老的意义。儒家对于尊老敬老思想的阐发，将外在强制性礼制转化为人们内在的自觉道德行为，揭示了尊老敬老的合理性，在尊老文化史和社会保障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伦理道德观念中，“孝”观念对养老制度的发展影响最大。实践证明：孝对于家庭和睦，培养“尊老”风尚，发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的仁爱之心，保障社会安定等等，都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儒家思想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忠孝思想影响越来越大。由于“孝”起到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特殊作用，经过儒家的粉饰，也就成了推行教化的工具，出现了“三纲五常”等礼法。因此，孝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尊老对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统治秩序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五、调均济贫

汉初，经济凋敝，贫富悬殊不大，推行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时没有调均思想的市场。至文景时期，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贵族和豪强大族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政策下，大量兼并自耕农，社会向贫富两极分化。到了汉武帝时代，贫富分化情况更加突出，人口渐繁，耕地渐少，富者田连阡陌，贫人无立锥之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汉代的调均思想发展起来，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对调均也有不少关注和议论。董仲舒认为，贫富悬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富”阶层因富而骄，骄则生暴，骄横轻慢，不守礼法，僭越作乱。“大贫”阶层为生而忧，因忧而为盗，起而造反。所以，“大富”和“大贫”都会引发祸乱，影响社会安定。贫富分化源自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富者愈贪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19]181，社会便难以治理。“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7]2521刑罚不可能从根本上禁止穷困百姓为生而斗争，上策是实行德治，以德化民，以德安民，使上下和睦，稳定社会。富人凭借“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造成百姓的穷困，“日削月朘”。他设想的对策是“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7]2521。

董仲舒“调均贫富”的原则不是主张平均分配，而是按照社会等级来分配，使不同等级的成员在财富占有上有差、有度、互不越制，把贫富差别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他所说的“调均”，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等手段，干预和调控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防止贫富过度不均，以安民保民，维护统治，实现上下相安，天下太平。他的“调均”思想包括贫富有差和贫富有度两个方面，立论重点是防止贫富过分悬殊。他肯定劳动人民对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要求的合理性，主张对民众应当先惠后使，先富后教，先德后刑。只有解决好民生问题，教化和政令才能畅行通达，民众才会听命于君主。这种主张被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奉为治民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有饭吃，有衣穿，是天下安定均平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淮南子·兵略训》说：人民衣食没有保障，“分不均，求不澹，则争”。《说苑·政理》亦云：“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因此，帝王要列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

董仲舒调均思想的目的是想通过社会调节，使天下“易治”。贫富悬殊和“民不乐生”使社会难于治理，而调均可以实现“易治”，满足富者“示贵”的心理而不至于骄横，让贫者足以养生而不忧愁生存，“财不匮而上下相安”。他提倡的重视农业、限民名田、禁止随意杀害奴婢、轻徭薄赋等措施，都具有限制贫富分化以保民、安民的作用。董仲舒把调均思想纳入到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之

中，既关注贫富悬殊问题，又将济贫调均与平时安民保民、救荒等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他以“调均贫富”诠释和发展了孔子的“均平”思想，对汉代以后理解和落实“均平”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班固认为“调均”的对象是“财”，调控社会财富是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根本。他说：“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因此，圣王治理百姓，应当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7]1117。

汉代自皇帝以下都很关注百姓的贫富和赋役的多少，政府还明确规定：基层官吏负有均平百姓赋役的职责。《后汉书·百官志五》说：“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

六、东汉宗教慈善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汉时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一般认其为中国最早的佛经译典。佛家劝人捐财货，乐施舍，所以治贫。不杀伐，行仁慈，所以治瞋。佛教戒杀乐施的教义已见之于汉代文献。明帝诏云：楚王英“尚浮屠之仁祠”[9]1428。班勇记天竺事，称其“奉浮图，不杀伐”[9]2931。襄楷说：此道“好生恶杀”。[9]1082袁宏《后汉纪》亦曰：“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佛教宣传的仁慈不杀最为世所称道。《四十二章经》曰：“佛道守大仁慈，以恶来，以善往。”此意以犯而不校、无瞋恚心为大仁慈。《四十二章经》谓沙门“去世资财，乞求自足”，“为道务博爱”，“博哀施”，“德莫大施”。《牟子》谓“佛家以空财布施为名，尽货与人为贵”。而当时所谓布施，尤其重视以饭食济人。《四十二章经》有饭善人一章。饭僧之事，在东汉初年即已流行。楚王刘英“设伊蒲塞桑门之盛饌”[9]1428，明帝退还其所贡献财帛佐助其事。汉末丹阳郡人笮融，“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李贤注引《献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费以巨万。”[9]2368可见其施饭规模之大，“亦可见汉代布施功德首在此也”[20]67。东汉末年疾疫流行，疫疠之灾造成的痛苦与不安弥漫整个社会，成为推动佛教传播的直接因素。在华僧人及传道者掌握了良好的传道契机，一方面以具体的医术、养生术赢得信赖，另一方面则翻译与养生(禅定)、医疗、神通有关的典籍以教授其信徒，并宣扬佛的智慧、神力和慈悲，以解释当时人的痛苦由来，并提供救贖之道。[21]65—75安世高在桓、灵二帝时能吸引众多信徒，便与其精通方术有关。其再传弟子康僧高在其《安般守意经》[22]163中说，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女耆域因缘经》，主要记载神医耆域(或以为耆婆)的故事。

先秦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东汉末年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中也有“平等、平均、财产共有”的主张。“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之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在太平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友好相处，互爱互助，不相侵争。“常言人无贫贱，皆天所生”，因此天下所有的人都要“爱之慎之念之，慎勿加所不当为而枉人，侵克非有”[23]576。不过，道教的理想国是在承认贫富等级差别的前提下，要求富人帮助穷人，通过人们之间的互爱互助达到社会太平，这种理想在阶级社会是难以实现的。[4]434

针对当时社会矛盾尖锐、贫富悬殊的严酷现实，《六罪十治诀》发出了“周穷救急”、举办慈善事业的倡议。“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恶恶也。”[23]242人人都应得到生存的条件，当有人失去这些条件时，其他人就应该帮助他们，富人应散其余财，周穷救急，不可见死不救，穷者受到周济后，则应感恩报德，不能自以为理所当然。有劳动能力的人应当扶助劳动能力低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智者当苞养愚者”，“力强当养力弱者”，“后生者当养老者”[23]695。智者、力强者和后生都是劳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具有赡养愚者、弱者和老者的义务，而不能嫌弃他们，这里颇有些所有成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意思。如果“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祸及自身，或殃及后代。“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六罪十治诀》)。天地化生的所有财物，没有固定的归属，既不上归于天，也不下属于地，属于整个人间所有，让它们能够交换流通，“职当主周穷救急也”。[23]246

《太平经》中还有大量与尊老重孝有关的内容，如“父为慈，子为孝，家足人给，不为邪恶”(《解承负诀》)。“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起土出书诀》)。“夫为子乃不孝，为民臣乃不忠信，其罪过不可名字也”(《六罪十治诀》)。卷九十六的标题即是“六极六竟，孝顺忠诀”，用了相当多的笔墨论述“不孝”的危害。

东汉佛教和道教中的慈善思想虽然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却是后世宗教慈善之先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里，各种自然灾害、战争、瘟疫和剥削制度的客观存在，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和下层民众的长期贫困，人民或因灾害而陷入困境，或因贫病交加而死于非命。灾害、战乱引发社会生存危机，进而动摇统治秩序，甚至造成朝代更替。统治阶级为使其江山永固，不得不提出各种社会救助和优恤的议论，当这些议论变成统治阶级的实际行动时，就产生了与之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汉代著名思想家与开明君主、官吏对救荒济贫、优待抚恤等的议论即是社会保障思想，并影响、指导着当时的社会保障实践。

任何思想、政策只有变为实际行动，才会产生实践效果。汉代有许多好的社会保障主张和学说，但不同时期的实践效果却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就在于“家天下”的统治，帝王旨意至高无上，好的社会保障主张往往难以变成统治者的制度贯彻实施；即使形成朝廷的政策，也会因为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发生变异。因此，各种社会保障主张和政策的采用实施，只能寄希望于“圣君”对灾民、贫民、士兵的“体恤”和“贤臣循吏”的力行。

从汉代的社会保障实践看，民本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保障思想是与专制统治思想共存的。汉代社会保障思想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不乏精华，但从总体上说，它属于统治阶级的得民之道、保民之道、治民之道。总之，无论是思想体系上的考察，还是政治实践上的验证，社会保障思想都属于专制思想范畴。

注释：

①如郭沫若《宋钐尹文遗著考》提出《管子》书“大率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收入《青铜器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此说又见罗根泽《管子探源》，收入其《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3—425页。

②彭林认为《周礼》成书于西汉初期，参见其《〈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参考文献】

- [1]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 [2]刘修明．贾谊的民本思想和汉初社会[J]．学术月刊，1986，(9)．
- [3][汉]贾谊．新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4]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5][汉]刘安．淮南子(诸子集成第三册)[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 [6][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于首奎等校释．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
-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汉]王符．潜夫论(诸子集成第四册)[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 [9]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1][汉]刘向．说苑全译[M]．刘鏊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 [12][清]严可均．全后汉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3][汉]桓宽．盐铁论(诸子集成第三册)[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 [14]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1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 [16]郑功成．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及其评价[J]．上海保险，1991，(4)．
- [1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8][明]黄道周撰．孝经集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香港迪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997．
- [19]董仲舒．董仲舒集·春秋繁露[M]．袁长江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20]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1] 陈竺同. 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J]. 暨南学报1935, (1).

[22] 大正新修大藏经[Z], 1934.

[23] 王明. 太平经合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李秀伟)

相关文章

我的留言

[进入讨论区](#) [关注社科网官方微博](#) [视频](#) [图片](#)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9487

[发表评论](#)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20人参与 0评论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 总共0条

[查看全部评论](#)

今日热点

- 亚航客机失联最新消息: 印尼海军已赶往失联海域搜寻
- 【亚航客机失联最新消息】亚航客机失联或因天气 反恐专家: 不排除人为影响
- 北约举行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任期结束仪式
- 授权发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
- 阿富汗局势最新消息: 北约宣布结束在阿富汗作战任务
- 阿富汗局势最新消息: 中国批准中阿富汗引渡条约

中国搜索云推荐

- 前瞻2015中国外交、经济等7看点
- 未来五年进党政班子的人如何选?
- 国外资本主义理论新动向
- 为什么我国不能搞西方的“司法独立”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
- 人民日报反思青春片不足: 单一怀旧
- 养老“并轨”三问
- 青年教师: 科研和教书哪个更重要?
- 改革元年: 蹄疾而步稳
- “中国崛起”内在逻辑与领袖抉择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 | 关于我们 | 法律顾问 | 广告服务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 旧版入口

电话: 010-84177688, 84177875 业务推广: 84177878 E-mail: zgshkxw_cssn@163.com 京ICP备11013869号

中国社会科学网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2011-2014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